何兆武：穷酸的西南联大与三位诺贝尔奖得主
——真正意义上的世界一流大学

西南联大的历史，前后不过8年半（1937年9月至1946年5月） 。 当年的物质条件可够穷酸的：学生宿舍无一砖一瓦，全是夯黄土为墙，堆茅草为顶，窗户没有一块玻璃，仅有几根树枝聊以象征。 绝大多数师生经常是食不果腹，衣不蔽体，不时还要在敌机轰炸下逃生。

在校学生不超过两千人。可是当年的西南联大，在三不管的地方，坚守大学理想，主张“教授是大学的灵魂”，实行“不妄用一钱，不妄用一人”；教师为爱国而教，学生为救国而学，吃红薯干，点桐油灯，以苦为乐；励精图治，弦歌不辍；为人师表，一身正气；人格独立，不党不官；不亢不卑，敢于批判；沉潜专注，甘于寂寞。一言以蔽之，“五四”运动所倡导的“科学和民主”精神之传承与发扬光大也！因此，培养出三位诺贝尔奖得主——杨振宁和李政道，另一位则是朱棣文（其父朱汝瑾是联大助教，其姑朱汝华是教授——曾昭抡的得意门生）。

拥有国家一流的教授阵容；运行一套“思想自由，兼容并包”、纯粹研究学问的办学理念；推行一种通才教育的培养目标；有一位深孚众望的校长——这些因素奠立了西南联大堪称世界一流大学的基础。

西南联大身后的三校（ 北大、清华和南开） ，当今在校学生总数当在六万至七万之间，相当于当年的三十多倍，三校校园内高楼大厦林立，与当年西南联大的茅屋草舍相比，真是天壤之别。所耗费的资金当在西南联大的数百倍以上。三校的年寿，从1950年算起，已有59年，若从改革开放算起，亦有30年，为当年西南联大寿命的4倍至5倍。以人力、财力和时间来看，都是当年西南联大无法望其项背的。以如此优越的条件和实力，却培养不出世界一流杰出的人才——60年来无1人获得诺贝尔奖，其故安在！？

清华大学一位教授在美国访问时发现，世界一流的哈佛大学大门，却是十分古旧俭朴的：拱型的门洞是用红砖砌的，中间是铁制的大门，门框上面是三角形的尖顶。 两边的围墙也是红砖砌的，中间是陈旧的铁制护栏。但是而今中国学校的大门，甭说大学，就是一些重点中学的校门，也比哈佛大学的壮观。在一些国人看来，似乎要成为世界一流大学、一流中学就在于校门以及办公大楼的气派和壮观！？

我国是世界最大的发展中国家（最大的穷国），美国是世界最大的发达国家（最大的富国）。这位清华大学教授还看到在这世界最大的富国中，名牌大学的办公大楼和办公家具仍是俭朴的：楼房大多是3层的，上个世纪的转盘电话和用过多年的木制家具还在使用。而在我们这个世界最大的穷国中的某些名牌大学，转盘电话和古朴的木制家具早已（淘汰）不见踪影！仿佛这些“过时”的东西，与名牌大学的“身份”太不相称了吧！

清华大学前校长梅贻琦说过：“大学者，非谓有大楼之谓也，有大师之谓也”。靠浮华的“形象工程”能建成世界一流名牌大学吗？

早在两千多年前，古希腊哲学大师亚里士多德就说过，产生杰出的思想家和杰出发明家需要三个条件：一是对学问有真正的兴趣，二是有充分的思想自由，三是有充足的闲暇时间。

北京大学前校长蔡元培说过，“大学并不是贩卖毕业证的机关，也不是灌输固定知识的机关，而是研究学理的机关。所以，大学的学生并不是熬资格，也不是硬记教员讲义，是在教员指导之下自动地研究学问的。”

“尤当养成学问家之人格”。“所以延聘教员，不但是求有学问的，还要求于学问上很有研究的兴趣，并能引起学生的研究兴趣的。”

这些学术大师是许多人、甚至一些大人物推崇备至的，但其办学理念在现实中却常弃之如敝履，也许正是我们需要深刻反思的。

（2011-05-06）
（ 本刊摘编自《随笔》杂志2008年第2期何兆武《关于诺贝尔奖情节》）